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創系十週年叢書總序 i

自序 3

第一章

寫在「拔郢」之前

16 一、紀南城最好的時光

19 二、「郢郢之戰」

22 三、遺忘 / 發掘簡史

第二章

製作紀南城

29 一、兩棲城市的運作

46 二、洪水、王權與宮城區的生成

55 三、討論：複調的時間線

第三章

尋找「普通人」

- 66 一、「普通人」難題
- 70 二、楚都的日常生活空間
- 98 三、討論：接受瑣碎與偶然

第四章

發現「城郊」

- 105 一、早期「郊」概念批判
- 112 二、郢都郊外見聞
- 125 三、討論：城郊的行政管理

第五章

超越「拔郢必然論」 129

附錄：紀南城內已發表的 ^{14}C 測年數據 145

自序

這本小書可以算作七年前第一次到湖北荊州訪查楚故都紀南城遺址至今個人思考與研究的一點小結。

在若干回走訪紀南城的經歷中，2018年5月20日是頗為特別的一次。那天下午，我從紀南城西半部新橋村一條不知名的小路出發，打算橫穿城址，沉浸式了解包括楚王宮殿區在內的幾處重要遺跡。要從此處抵達城東頭，只能經由最南邊的楚都水門遺址附近的一道小橋，跨過新橋河才行。於是我腳下的景觀，從剛開始時堅硬的水泥馬路，逐漸變成分岔出去的鄉村土路，等到最後回過神時，已廁身在稻田田壟上狹窄的小徑之間了。碰巧頭天剛下過大雨，地表泥濘不堪，一腳下去能帶起半腳灰泥。很快地，我便陷於進退兩難的境地。來之前用高德地圖和谷歌地球從天空中精心規劃過的路線，在真實的地表狀況面前都化作笑談。離我不遠處有幾位穿着橡膠雨靴的老農，此刻正在水田裏若無其事地插秧。南方空氣中的潮濕和泥土的腥味混合着周遭儂張的綠意，錯綜的岔道蔓延消

失於搖擺的雜木之中。前方殘缺的南城垣突然奪道而出，其夯土斷面鮮亮的黃褐色橫互在了眼前——這個瞬間讓我意識到，紀南城遺址實在是一個異常複雜深邃的構造。這種複雜性倒不首先地在於它是一座往昔大國的都城，或因此它與戰國歷史的深度糾纏——歷史話語所建構的符號層面的複雜性毋寧說只是抽象的，甚至是抽離的——我所體會到的複雜性，是紀南城在傳統歷史話語之外作為物的實體的質感，是它在被人群使用、生活的過程中形成的盤根錯節的富饒而具體的存在。

正是在這樣的認知（或說想像）之下，我希望藉由這本小書重新思考應該如何理解紀南城幾十年考古發現的碎片。

與此對應的，本書嘗試的「城市傳記」的寫法，是有意要在展開對紀南城這座長江巨都的敘事過程中，打撈起一些短暫的、雖談不上宏大但也絕非沒有意義的情節，以此看見都城內外那些曾被「長時段」視角的洪水所沖走的速生速滅的人群的「活法」。但這並不意味着本書在考古學材料的運用上有所遷就或鬆懈。恰恰相反，本書提出了一些自認為在以往紀南城考古上未受重視或被忽略的重要議題，比如第二章對「製作主體」、第三章對「普通人」、第四章對「城

郊」和第五章對「拔郢必然論」的討論，等等。顯然，本書一些新的提法更多是拋磚引玉，筆者並不認為自己已經有了完美的答案。

在對紀南城遺址的研究過程中，筆者一直得到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方勤院長、羅運兵副院長，湖北省博物館王紀潮和曾攀主任，荊州博物館楊開勇館長、李亮副館長，以及熊家冢遺址博物館田勇館長的大力支持和慷慨幫助，謹此致以特別的感謝。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楚文化研究所聞磊所長曾親自帶筆者考察紀南城的核心理區，參觀考古工作站，並在過去數年間不厭其煩地解答筆者的疑問，分享他所負責的紀南城遺址發掘項目的最新成果，令筆者受益良多。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宋江寧、王紀潮、聞磊、劉建業、王慶鑄、樊榕、郭濤、王文欣和武夢如等諸位師友分別閱讀了不同的章節，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和建議；同時，我有幸可以提前參閱王紅星研究館員尚未出版的《紀南城志》書稿中關於城址發掘史的部分；此外，我也受到了劉彬徽和郭德維兩位前輩學者的鼓勵。筆者在此一併向他們表示誠摯的謝意。書中若有錯誤，概由筆者負責。

作為香港城市大學「CityU Start-up Grant For New Faculty」基金資助項目「南中國的地方、首都與邊

緣：江陵社會轉型的考古學研究（前 400 年至前 100 年）」（項目號：7200757）的階段性成果，本書除第四章外，其他各章均未曾發表過。第四章「發現『城郊』」改寫自筆者 2023 年刊發在《江漢考古》第 3 期上的〈城郊空間的構造與重塑：楚都紀南城南郊「拔鄧」事件前後的考古學考察〉一文大約二分之一的內容，在此也感謝《江漢考古》編輯部的玉成之意。彩圖一和彩圖二的地圖底圖為武昊博士幫助設定。彩圖四、彩圖五、彩圖六和書中圖十二獲得湖北省博物館的惠允得以使用。圖三和圖四的 3D 重構係在香港城市大學建築系碩士謝卓倩同學的協助下完成。其餘圖片均為筆者拍攝或據相應考古報告圖片繪製。

限於作者的學識，加之荊州考古事業的日新月異，本書存在疏漏與謬誤不可避免，懇請讀者批評指正。

第一章

寫在「拔鄧」之前

戰國時代（前 403 年－前 221 年）楚國設在江陵的都城「郢」，可以說是一座因其出人意料的結局而在兩千餘年後仍被銘記的城市。¹ 歷史記載中，它的悲劇被簡潔而平靜地概括為「拔郢」二字。「拔郢」是

指在公元前 278 年，秦將白起（？－前 257 年）南下攻陷楚都郢，迫使楚頃襄王（前 298 年－前 263 年在位）遷都於陳的歷史事件。文獻中的郢都恢弘、繁華，令人神往；但遭此兵燹過後，它的訊息遂消失於史書之間。「拔郢」使得楚國成為戰國大國中第一個因軍事潰敗而棄都的例子，楚由此失去了它賴以為腹心和根基的縱深的江漢平原。另一方面，「拔郢」解除了秦人征服戰爭中來自南方的威脅，令其得以深入長江中游，對東亞大陸早期歷史的走向產生了複雜而深遠的影響。² 毫無疑問，楚都「郢」是這段歷史的重要參與者和見證人。

今日的紀南城遺址便是戰國時代的楚都郢。它是中國南方迄今為止發掘的體量最大的先秦城址。³ 它位

1 中國歷史上的「戰國」時代，其起始之年的選定不止一種。常見的有以換算西元之後的前 480 年、前 475 年、前 453 年或前 403 年等年份為起點。本書選擇的起點是公元前 403 年。原因與其說是依從《資治通鑑》，以前 403 年「三家分晉」事件作為「戰國」歷史的開端，不如說是為了照顧考古研究上對時期劃分的需要：荊州一帶對戰國墓葬的分期，尤其是對紀南城內遺存的分期，以筆者的解讀，一個未曾明說的選擇其實是將「戰國」的起點放在了西元前五世紀後期這個時段內。幾個備選項中，最接近的就是前 403 年這個年份。很顯然，基於事件發生精確年份的歷史學分期，與基於器物類型比較推斷相對時期先後（特別是未經碳十四測年或沒有發現銘文紀年的情況下）的考古學分期，所得的結果是性質和精度皆不相同的兩種時間。本書討論的考古材料來自有史記載的歷史時期，所以遵照世界各地涉及歷史考古時一般的處理慣例，為了討論的方便與效率，只能讓歷史學的分期與考古學的分期做一點合理範圍之內的彼此遷就。

2 Dewei Shen, "The First Imperial Transition in China: A Microhistory of Jiangling (369-119 BCE)" (PhD diss., Yale University, 2021), 17-18, ProQuest (2557213815).

3 許宏：《先秦城邑考古》（上編），北京：金城出版社 / 西苑出版社，2017 年，頁 294－296。另外，上世紀 90 年代曾推測楚國最後的都城、位於淮河以南不遠的壽春城佔地可達 26.35km²，超過了紀南城的面積；但這個數字，由於目前對壽春城城垣的具體位置還在尋找中，故尚未能實證。見張義中、張鐘雲：〈壽春城遺址考古的新進展〉，《大眾考古》，2024 年第 1 期，頁 28－42。

於江漢平原西緣，在今天湖北荆州市區北郊 5km，南距長江（荆江段）約 10km。⁴ 這一片地方古稱「江陵」（見書前彩圖一）。自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考古學家們在紀南城內外進行了持續的勘查與發掘工作。由此獲得的一系列前所未見的新發現，讓這座本可能在時間中下沉湮沒的長江巨都，又重新浮出歷史地表。紀南城的始建年代歷來都有很大爭議。⁵ 筆者根據半個多世紀以來細緻的考古學研究，以及最近的發掘和部分最新碳十四測年結果（見〈附錄〉），認同楚都紀南城興建於公元前四世紀初前後，存續至「拔郢」的發生，總共有一個多世紀的都城使用史（詳見第二章）。

這本小書要做的，正是立足於紀南城考古歷年來累積的豐富成果，為戰國的楚都郢撰寫一篇城市傳

記，以探索「郢之未拔」之時的日常，重構這座南方故都的生命軌跡。本書主要有以下三個特點：

第一，短時段。以筆者目力所及，為一座時間跨度僅一個多世紀的先秦城址書寫傳記，是一個新鮮的嘗試。我們可以借由它管窺中國南方的戰國都市社會在一個相對短暫時段內的變與不變。中文世界中常見的書寫城市的文類是縣志和地方志，成果汗牛充棟，但其對象一般是秦漢以後直至當代的城市或地區。先秦某座城址的考古學報告也可看作一種特殊類型的城市書寫，但其視角天然地就是「長時段」（*longue durée*），往往橫跨幾百年甚至千年之久（如長江下游的良渚古城）。相比之下，生命周期短暫的楚都郢，落在以上諸種城市書寫傳統之外，具有獨特標本的意義。

第二，微觀視角。由於戰國文獻資料自身的特色與傾向性，歷來研究者偏好由政治、軍事、外交、策略、交通、制度、經濟等等宏觀的面向入手敘述戰國歷史。除了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本書特別強調以郢都這樣一座特定的戰國都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不僅重構楚王的宮城區，也鉤沉紀南城戍衛的門房、陶工

4 戰國時荆江離楚都紀南城更近，在今日荆江以北約 3km 至 4km 的位置。

5 尹弘兵做過詳細的綜合論述，參見其《楚國都城與核心區探索》，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至於這之前的，特別是春秋時期的楚都在哪裏，目前聚訟紛紜。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它們並不在紀南城。

經營的作坊、掉落井中的遺物，以及不同形式的普通居民區等等細節。從這樣一個微觀的、內部的與在地的視角觀察，筆者希望還原這座巨都內部與周邊一些常常被忽視的「日常」，理解在此「日常」之中生活過的精英及普通民眾的體驗與選擇。

第三，新敘事。「戰國」一詞超越對政治實體的稱呼而成為表示時代的概念，出自西漢劉向編纂的《戰國策》。⁶ 作為正史的《史記》也大量參考過與《戰國策》同源的資料。《戰國策》這種文類是以權謀詐術為內核的策書，閱讀它從而得出對戰國時代的印象，自然會如劉向所說：「……遂相吞滅，並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溘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為戰國。」⁷ 然而筆者認為，戰爭、暴力、鮮血、死亡只是

對「戰國」理解之一種。新出的考古材料極大地豐富了「戰國」的面相與傳達的歷史情緒，已經無法為劉向理解的那個「戰國」所概括。楚都紀南城遺址提供的一系列物質信息，允許我們至少在局部上去探尋關於楚、關於戰國的新敘事。

為了突出以上特點，本書不得不作一些取捨：首先，小書不涉及戰國時代之前的楚國、楚君或楚文化，也不試圖參與討論它們與紀南城之間的關係。「楚」無論作為政權還是文化，都擁有漫長的發展史，幾乎其所有時段都有大量優秀的學術成果行世，為筆者所無力一一顧及，讀者則可自行參考。未來的研究當然更可進一步將紀南城放入更長的時段或更廣的戰國城市網絡中關照。其次，紀南城周邊探明或發掘的各種規模的戰國墓葬數量應已過萬（主體為楚式墓）。隨着考古工作的推進，這個數字還在增長，相應的研究也層出不窮。限於篇幅與筆者能力，也為了論述的集中，本書並不打算系統性地討論紀南城外的墓葬。另外，我們對楚都的民眾尤其感興趣；他們的墓葬雖然數量眾多，但與隨葬品豐富而奢侈的精英大墓相比都很簡陋，並不能告訴我們太多與其「日常」

6 楊寬：《戰國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頁2。

7 [漢]劉向輯錄：《戰國策》（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1196。

有關的信息（詳見第三章）。墓主的日常是在對中型以下、特別是小型墓葬研究中力所不能及的方面，故這些墓葬暫且只能捨去。再次，本書也不會過多描繪宏大的「戰國形勢」。有關「戰國形勢」的話語，本質上是一種歷史解釋的手法，認為可由外部的、「國際」的形勢，比較直接地解釋各國之內的對策、決定和行動。這與筆者探索的一個楚都的內部視角是相衝突的。為了擴充內部視角，必須壓縮外部視角。在第五章我們還會看到，這種從「戰國形勢」出發的外部視角本身也帶着預設甚至偏見，是成問題的。聊以自慰的是，以上的幾點割捨，似乎並不影響我們去達成既定的目標。

以下將先介紹楚都鄧作為物質文化的存在，於戰國時空中的獨特地位，它最好的與最後的時光；之後會用三個章節的篇幅，分別描繪楚都的三類空間，討論它們如何被相關的人群使用和運作，以及由此形成的種種景觀。這三類空間分別為：楚都的基礎設施和楚王宮城區，楚都的日常生活空間，以及楚都之外的城郊空間。筆者認為，紀南城的成長總體上受到了城市化的影響。然而，城市化對這三類空間的影響程

度各不相同，並且也不是唯一的力量。我們將深入分析除城市化以外其他過去不為人所注意的重要因素，揭示這些因素如何同等參與塑造了紀南城的發展軌跡。

需要指出的是，本書使用的「城市化」概念偏重物質的層面，主要指三類彼此關聯、可在考古學上進行識別的現象：第一，一個城址內部的高台建築和基礎設施（包括城牆）數量的增多、規模的增大與分佈範圍的增廣；第二，該中心城址周邊附屬的次級聚落在數量、密度和分佈範圍上的顯著上升；第三，該中心城址與其附屬次級聚落內居民活動的遺跡在數量、密度和分佈範圍上的明顯上升。

最後，我們必須承認，考古的物質材料所承載的，正與出土或傳世文獻的文字資料類似，都只是歷史信息的碎片甚至粉末。本書捕獲的浮光片影，也只是將這些碎片黏合起來並作出闡釋的所有可能方式中的一種而已。相信隨着考古學科的發展，楚都鄧在未來會呈現出更加清晰的面龐。

一、紀南城最好的時光

楚故都紀南城遺址的輪廓大致呈方形，城市軸線由北向東傾斜約 10 度。城址東側連通遼闊的長湖，地形為平原窪地。長湖的岸邊台地歷年來發現數座等級極高的戰國楚貴族大墓。在紀南城的西北方向則是八嶺山與紀山，為荊山餘脈逶迤形成的丘陵山區，山區內楚墓墓塚林立（見書前彩圖一）。紀南城城址的周長為 15506m：其中北城垣長 3547m，東城垣長 3706m，西城垣長 3751m，南城垣長 4502m。城牆夯築現象明顯，夯層一般厚約 10cm。一直到八十年代，除去極少數靠河部分被水沖毀，以及斜穿的 207 國道——1981 年前稱襄（陽）沙（市）公路——壓住東垣的一段以外，高聳的城牆絕大部分保存完好，高度一般能到 8m 以上。⁸ 一種推測是原城牆或在 10m 上下。⁹ 八十年代以來，城垣高度因各種生產活動影響

大大降低。現在各牆的最高點從 3.9m 到 7.6m 不等。對幾段城牆的解剖顯示，城牆主體上部寬約 10m 至 14m，以內外護坡加固。外護坡上部一般寬 6m，坡度較陡，以防禦外敵攻城；內護坡上部一般寬 10m，坡度較緩，便於城內士兵上下城垣。¹⁰

紀南城總面積為 16.6 km²。若以北京故宮（0.72 km²）為參照，相當於二十三個故宮相加的總和。與紀南城同時期、面積達到 10 km² 以上的城址，目前全國僅發現了十八座。它們集中在北方，包括人們熟知的韓都鄭（10 km²）、趙都邯鄲（17.2 km²）、中山國都靈壽（18 km²）、齊都臨淄（20 km²）及燕都薊（32 km²）。連同楚都郢，這些城址只佔戰國已發現所有城址數量的 3.1%，是首屈一指的超級大都市。相反，當時約 70% 的城市，其面積都不到或遠小於 1 km²。¹¹

公元前四世紀後半葉，楚國的國力和疆域範圍都

8 湖北省博物館：《楚都紀南城考古資料彙編》，武漢：湖北省博物館，1980 年，頁 15。

9 郭德維：《楚都紀南城復原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年，頁 104。

10 湖北省博物館：〈楚都紀南城的勘查與發掘（上）〉，《考古學報》，1982 年第 3 期，頁 327。

11 Dewei Shen, "The First Imperial Transition in China: A Microhistory of Jiangling (369-119 BCE)," 33-36.

臻至頂點，號稱「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這一時期紀南城內的遺跡，亦顯示出與楚國自身這種擴張和上升趨勢同步的跡象。圍繞紀南城分佈的戰國大墓也在這一時期內密集出現。1957年安徽壽縣出土四枚鄂君啟錯金銅節，進一步明確了這個時期楚國疆域的大致範圍。根據銘文，我們知道這些銅節的性質是楚懷王（前328年—前299年在位）在前322年頒給鄂君（名「啟」）的通關憑證。這個憑證可使鄂君經商的車隊與舟隊經過楚國的關邑時獲得免稅的優待。學者徐少華指出，銅節上表示地名的銘文都是楚國疆域所至的端點或邊地。它們證實了楚在前四世紀晚期，西北抵達今陝西旬陽市，與秦接壤；東南直到今安徽蕪湖市水陽江西岸，與越接境；南邊盡頭至今廣西全州以北和湖南郴州一帶，與南越相接；而北境則在今方城、新蔡和壽縣一線，靠近其時韓、魏、宋、齊的邊界。¹² 楚都郢的佈局、規劃與規模，與其自身這樣一種總體形勢有着深切的關係。對楚國首都圈的統治

精英來說，前四世紀下半葉或許是風暴來臨之前最好的一段時光。

二、「鄢郢之戰」

然而，前四世紀末以後，秦、楚間的和平愈發難以維持。前280年，秦昭襄王（前306年—前251年在位）針對楚國的「鄢郢之戰」爆發。這一年，秦國司馬錯（前四世紀晚期—前三世紀早期）的軍隊先從楚西部發起進攻，楚只能割讓漢北與上庸地求和。司馬錯又發隴西兵由蜀地出，攻擊楚的黔中一帶。秦之所以在自己深入江漢平原之前，先行癱瘓楚在西部邊疆這兩處戰略通道上的作戰能力，有其戰術上的深意。倘若楚軍在這兩處仍有機動能力，則可以配合其分佈在江漢平原上的其他軍鎮，對猶入甕中的秦國部隊進行雙向的切割、圍剿，進而殲滅。

在完成西側對楚的打擊後，同一年，秦赦免刑徒徙於南陽，為從北側南攻荆楚準備勞務和兵役人口。接下來兩年間白起進入江漢平原後具體的伐楚路線，因涉及對一些重要地名的不同解釋，學者間認識頗有

12 徐少華：〈鄂君啟節與戰國中期的楚國疆域形勢〉，《歷史地理》，第35輯，2017年，頁1—10。